

無奈中的低落

——全國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衰退的若干面向研究*

汪朝光

[提要] 全國抗戰時期，因為國民黨始終堅持了抗戰，從而達致其執政聲望的高點。然而，全國抗戰時期的國民黨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導致其統治力不升反降，處在持續的低落與衰退中，其中尤以貪污腐敗問題的影響力最大，而派系之爭和獨裁體制等等，又為此而推波助瀾。結果，當抗戰勝利之時，國民黨的領導力、執政力、影響力都大幅度下降，成為其在戰後國共相爭中敗北、很快失去大陸政權的直接或間接動因之一。

[關鍵詞] 抗日戰爭 國民黨 蔣介石 統治力

[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4 - 0005 - 20

在 1937 ~ 1945 年的全國抗戰時期，作為當時中國執政黨的國民黨，始終堅持了抗戰，並因抗戰勝利而達致其執政聲望的高點。然而，國民黨與抗戰的關係也是一體兩面，既有堅持抗戰的高光榮耀時刻，也出現了種種影響其執政地位的消極因素和負面問題。經過全國抗戰八年的洗禮，與中共戰時的卓然崛起之路相比較，國民黨的統治力卻不升反降，處在持續的低落與衰退中。其間之作用因素多多，尤以貪污腐敗問題所致之民心起落為最大，而派系之爭和獨裁體制等等，又為此而推波助瀾。結果，當抗戰勝利之時，國民黨的領導力、執政力、影響力大幅度下降，成為其在戰後國共相爭中敗北、很快失去大陸政權的直接或間接動因之一。本文討論全國抗戰時期尤其是抗戰中後期影響國民黨統治力衰退的若干面向，^①期以推動相關研究的進展。^②

蔣介石個人獨裁致國民黨統治力的下降

1943 年 8 月 1 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慶去世。國民政府主席雖為國家元首，但在國民黨主導的統治架構下，其實際權力卻因人而異。1928 年 10 月至 1931 年 12 月蔣介石任職期間，國民政府主席作為國家元首的名義和權力相一致，而且在蔣的主導下，《國民政府組織法》經多次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抗戰研究專項工程課題“中日關係史論著目錄”（項目號：16KZD006）的階段性成果。

修訂，主席權力不斷擴張。根據 1931 年 6 月修訂的《國民政府組織法》，國民政府主席可以提請任命五院院長，公佈法律，發佈命令，“實有極大的任免權”；再加蔣介石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權力是十分隆重的”。但是，1931 年 12 月，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辭國民政府主席職，為避免接任者循其例掌握國家最高權力，蔣在下野前特意主持修改了《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不負實際政治責任”，“不得兼任其他官職”，五院院長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③國民政府主席成為禮儀性、象徵性的虛職，“立於超然的地位，至多不過能向行政院及其他各院隨時量予忠告，初不能決定，亦不能抵拒各院的政策。”此後，時任立法院長的林森因“年高德劭”出任國民政府主席，他被認為在任上“恬靜守法，對於各院的決定，亦從未採取干涉態度。”^④正因如此，在國民黨內激烈的派系之爭中，林森以超然自居，任職期限一延再延，連任 12 年，直至逝世於任上。

林森逝世後，由誰接任國民政府主席，為各界所矚目。或者是維繫林森時期的舊制，仍由“年高德劭”者擔任，不負實際政治責任，但是，此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因加入同盟國作戰而有很大提升，國民政府主席對外代表國家，如果仍由擺擺樣子的“年高德劭”者出任，難和同盟國領袖平等對話，客觀上有改變的必要。或者是回復蔣介石任職時期的體制，這對蔣再任此職有莫大的吸引力。蔣介石這時擔任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等職，雖然掌握著實際的最高權力，但因不是國民政府主席，距離名義上的國家最高領袖還有一步之遙。林森在世，蔣介石格於權力平衡難作變動；林森離世，則為蔣介石出任此職提供了天賜良機；而以蔣介石當時的權勢和地位，國民黨內也無人可與爭鋒，此職非蔣莫屬。

還在林森因病臥床不起時，考慮到國民政府主席的職責不能或缺，王世傑、吳鐵城、陳布雷等蔣的親近下屬曾向蔣介石請示機宜，蔣謂“由行政院長暫代為宜”。^⑤蔣介石這時正擔任行政院長，可見蔣當仁不讓，直截了當地表示了出任此職的意願。

1943 年 5 月 29 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決議，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增加“國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長代理”的條文，並刪去國民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其他官職”的條文，^⑥從而為蔣的接任預留地步。8 月 1 日林森逝世，當晚國民黨中常會即決議由蔣介石代理國民政府主席。雖然如此，但蔣究為臨時代理抑或正式接任，在國民黨高層內部則有不同看法。在蔣身邊工作的中央設計局局長熊式輝早先曾建議由孔祥熙接任國民政府主席。^⑦林森逝世後，熊式輝曾當面詢問蔣介石，國民政府主席“是否由總裁兼，抑另推人？”蔣告“仍由我兼之，以免他人爭議。”熊又詢蔣“自兼之利害如何？”蔣認為“無何不可”。^⑧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王世傑也不主張蔣介石接任國民政府主席，理由是“總裁兼主席非改制不可，利少害多，不如不兼，但注重政局之革新。”因此，他主張“仍以依法推選德望崇高者一人繼任為宜”。^⑨熊式輝和王世傑當時與蔣介石的關係都較為親近，熊且被外界認為是蔣所信任的謀臣之一，他們為何不能體會蔣意，不主張蔣接任國民政府主席，究其本意並非另有主張，而是擔心過去為蔣離任而修法，現在又為蔣接任而再度修法，可能引起外界批評，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未必有利。但他們的看法不過是謀臣之見，蔣介石當然要作有職有權的國民政府主席。8 月 28 日，蔣介石約集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和國民黨高層官員討論此事，戴季陶、王寵惠、吳鐵城等都秉承蔣意提出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蔣介石雖“未作表示”，但意思卻很明白，“實際上勢將修改組織法。”^⑩

隨後，9 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修改後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決定國民政府主席任期由二年改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國民政府主席為陸海空軍大元帥，對外公佈法律，發佈

命令；五院正副院長由主席提請國民黨中執會選任；國府主席對國民黨中執會負責，五院院長對主席負責。^⑩國民政府主席的職權全盤恢復到1931年蔣介石下野前的設置。9月13日，蔣介石正式接任國民政府主席。^⑪

蔣介石出任國民政府主席，擔任了國民黨治下黨政軍的所有最高職務，成為國民黨統治架構中惟我獨尊的“最高領袖”和個人集權獨裁者。理論上，蔣之集權有利於在戰時提高施政執行力，而在實際上，由於國民黨組織不健全，組織力不夠，蔣的決策經過層層傳導之後，越往下執行力越低落；又加蔣的兼職過多，即便依靠龐大的秘書班底，也無力及時處理所有重要公務，而國民黨各級官員出於“媚上”或“爭寵”等考慮，其工作往往又依賴於所謂蔣之“手諭”“親命”方能推動。如陳誠對胡宗南言，“一向各級對委座手令無不遵行，對待從室所發次之，對各部命令確有不能遵行，亦不能實行者”。^⑫然而，權力如此集中於蔣的結果，反而造成國民黨從上到下坐等蔣一人之決策，各級幹部都缺少主動進取心，施政的執行力反而下降。劉斐認為，“委員長感嘆無人負責辦事，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係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⑬王子壯認為：“目前事權集中於總裁，一切比較統一易行，而其缺點，則在以向總裁上簽呈之少數人為中心，各方顧慮未必能以周全，先後亦不免紛歧”；“蔣先生之日理萬機，無暇考慮各方，而易為各方所蒙蔽，確為事實，加以好勝心強，不易接受各方之真確意見，為之幕僚者，乃順其意旨，唯唯諾諾，不肖之徒，乃利用機會，以圖利己，法紀蕩然，此目前政治上癥結之一。”^⑭即有少數敢於直言提出不同意見者，亦不為蔣所喜，不為其重視或採納。據徐永昌記載，某次會中，“關於蔣先生擬主辦物價統制問題，張文伯（張治中）反對由委員長主辦，並及行政院開會，某人謂有委員長手諭云云。某人謂我已有委員長手諭，一箱都在，藏著不能辦，此一手諭有何大不了。蔣先生大怒，立令文伯指出何人所言，並再三再四催促其指出，文伯窘甚。”^⑮

蔣介石兼職過多，甚而有自己給自己下令發文的荒唐之舉，而且蔣不信任下屬，凡事總喜自己決策，以自己的意見為轉移，甚而繞開必須的程序，我行我素，瞎指揮，亂指揮，結果造成國民黨內事務巨細，無人能負責，亦無人敢負責。如徐永昌言，“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書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委員長之要求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⑯王子壯則認為，“近年以總裁身旁至少諍言，且往往蒙蔽事實以飾非。如物價高漲，彼並不深知，外出購物，左右則先囑店鋪低喊物價。此種作偽甚非國家之福，其尤者更利用弱點，以邀總裁之歡心”。^⑰

圍繞著蔣氏個人獨裁的國民黨統治體系架構，在抗戰過程中已經是弊端百出，執行力也因此而日漸下降，並為戰後國民黨統治的進一步衰頹埋下了遠因和伏筆。

戰時貪腐的蔓延及其治理不彰

全國抗戰前期，民氣昂揚，眾志成城，國民黨對抗戰也較為積極，為呼應民眾訴求，對貪腐行為有較多的約束，各級官員的貪腐行為也還未至太過彰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隨著局勢的變化，國民黨官員的進取心較前有所低落，貪腐行為也開始發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國陣營的一員，一方面為中國抗戰獲得了重要的國際支持，一方面也使國民黨鬆了一口氣，認為依賴盟國的支持，對日抗戰勝利有望，從而愈加保守而不思進取，染上了越來越深重的暮氣。不少國民黨官員在後方的所謂“和平”環境下，無所用心和作為，反而大肆謀取

個人私利，貪腐行為不斷發展蔓延，成為引起民眾和社會輿論強烈反感及批評的焦點問題之一，也是導致國民黨統治力衰退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體制建設而言，國民黨有關約束和懲治腐敗的法律、法規與體制、機構，基本上在戰前已經建立，全國抗戰開始後，根據戰時的特殊需要，對其中有些法律、法規和體制、機構有所調整。

1938年4月1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要求“嚴懲貪官污吏，並沒收其財產”。^⑨同年7月，國民政府公佈《懲治貪污條例》，規定凡有礙於抗戰的貪污行為，如克扣軍餉、索取軍火採買或軍事建設回扣、盜賣侵佔軍用品、以軍用交通工具運輸違禁品、強徵勒索、擾亂金融等行為均可列為貪污，可處10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犯罪者的財物一律追繳；長官明知下屬貪污有據而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以共犯論。^⑩該項條例對貪污罪的懲治規定，較戰前刑法對貪污罪的處理顯然更加嚴厲，處罰力度從10年徒刑加重為死刑，其適用之廣、用刑之重為國民黨當政時期所少見。

鑒於國民黨當政時期公職人員經商的普遍性及其對官風和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1943年1月修訂公佈的《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不得直接或間接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同時又規定，“兼任公營事業機關或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監察人，不在此限。公務員投資於農工礦事業而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或股份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者，不以經營商業論”。在這樣的“但書”之下，前條規定公務員不得經商的意義被大大消減，因為很多公職人員經商的途徑，恰恰是擔任股東，而且是有特權的股東，既然擔任股東不算經商，他們的“事業”當然也就不受任何影響了。^⑪

在監察體制功用的調整方面，國民黨在戰時的重要舉措，是賦予監察院糾舉權。根據《非常時期監察權行使暫行辦法》的規定，“監察委員或監察使對於公務員違法或失職行為認為應速去職或為其他急速處分者，得以書面糾舉，呈經監察院院長審核後，送交各該主管長官或其上級長官”；主管長官“應即決定撤職或其他行政處分，其認為不應處分者，應聲覆不應處分之理由”；主管長官不作為者，“監察院應即以該糾舉文件為彈劾案，移付懲戒機關。各該主管長官或其上級長官於被彈劾人受懲戒時，亦應負責。”同時，該“辦法”還規定，對於各機關或公務員對於應辦事項奉行不力或失當者，監察委員得書面提出建議或意見，主管機關應為適當之處置。^⑫糾舉權賦予監察院一定的執行能力，相較過往彈劾案移付懲戒機關後遲遲沒有下文的拖拉狀況，糾舉權的作用更為迅捷、簡便、直接，處理時限和效率亦有不少提高。自1937年到1947年，監察院共提出糾舉案884件，涉及1,539人。^⑬從1942年到1947年，監察院共提出彈劾案560件，涉及941人。^⑭如果以彈劾和糾舉的比例而言，顯見糾舉案在當時的監察工作中已經佔據著相當的分量。

全國抗戰時期，國民黨為了強調其執政黨的責任和地位，也加強和提高了對黨員的監督要求。抗戰時期發給國民黨員的《黨員須知》中提出：“貪污中飽是政治腐化的病根，吏治不上軌道最大原因，直接增加人民的痛苦，間接在黨治之下，會引起人民對黨不良印象，甚至搖動了對黨的信仰。因此，對於貪污行為，必須徹底根絕”。^⑮在組織方面，全國抗戰時期，除了國民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之外，還由中央派出監察委員駐省，省黨部向各分區派出常駐委員，並佈置黨員監察網，以“對下級黨部及黨員執行監察任務”。^⑯然此時國民黨的監察體制較為“偏重於上級黨部對於下級黨部的監督，同級的監察委員會的監察漸次不能按照原來設置的目的而運用其職權”。^⑰再加其實際工作的成效不彰，國民黨的監察體制並未在約束和懲治貪污腐敗方面發揮其

應有的作用。^⑳

全國抗戰時期，前方將士奮力抵抗，後方民眾生活艱難，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部分國民黨官員的奢靡生活與貪污腐敗。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夫人作壽，“大張筵宴”，連擺兩天酒席，數達二百桌，“足見盛大。”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嫁女，來賓“華麗其服，高跟其履，何殊與戰前，由此等人身上，無由知抗戰已至八年，現在最艱苦之時期也。”銓敘部部長賈景德為討戴季陶之歡心，每逢戴之生日，“均送兩桌翅席暖壽，已行之有年。近更鑒於院長之寵太太，於是更送兩桌為太太暖壽。……而唯苛刻工作人員，媚上凌下有如此者，真余所見官僚之典型。蔣先生方稱其工作第一，戴院長譽為幹員，是國家政治方逐日較昔年北京政府腐惡以甚，可不歎哉！”^㉑雖然國民黨也通過了種種預防和懲治貪腐的法律法規，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也對此三令五申，警示告誡，但國民黨治黨不嚴，這些法律法規多半停留在紙面文章，而少見實際成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評論說：“貪污問題現時如人身血中毒，四肢百脈皆毒菌。”^㉒尤其是到了抗戰後期，國民黨內從上到下，不少官員不思進取，文恬武嬉，吃喝風、享樂風、腐敗風日漸滋長，腐敗行為趨於日常化、普遍化、全面化，甚而是小吏大貪。據徐永昌記載，“筳嶠一保長僅數月之間貪污百萬，巴縣一縣之田管處處長竟貪污至一千一百萬元、米四百餘石，人慾日甚，道德淪亡，政治遂敗壞至此，風俗因亦日益污下，人心腐爛，群競多金，人格墮喪，國格隨之低落，欲其廓然澄清，恐近十年殊難有望耳。”^㉓

當然，抗戰時期，畢竟仍有許多公務人員奉公守法，辛苦工作，為堅持抗戰而默默奉獻。然其所得有限，生活頗為艱辛。如王子壯的秘書，“家中售賣一空，前兩月將久買存汗衫兩件，以之售洋肆千元，以貼家用，今日已空，家中六口，無法生存，衣服襤褸，更其餘事，言下歛歛欲。”即便是王子壯本人，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身為部長級官員，但“一月收入，十日已空。……餅乾糖果久不入門，因數百元一斤，不能勝此擔負也。”所以他感嘆，因“在監察機關，則以清廉並檢舉為己，自應嚴以律己，不應有絲毫之玷污也，而虧累至日坐愁城”。^㉔只是這些守法公務人員的貧寒生活與社會大眾對一些政府官員生活奢靡的所知所感形成了強烈的認知落差，社會大眾所知所感者，多半為報端揭露或街談巷議之各級官員的奢靡生活與貪腐行為，並最終形成為他們心目中的國民黨“貪腐”形象定位，從而又使國民黨失去更多民心，為國民黨統治的衰退賦予更多的社會推動力。

役政腐敗的嚴重影響

兵役制度及其施行弊端，是抗戰時期國民黨官員腐敗行為的高發區之一，也為戰時國民黨統治的衰退帶來了深遠影響。

因為內外種種因素的作用，中國現代兵役制度始終未能真正建立。全國抗戰開始後，為滿足戰時兵員補充的需要，國民黨在1939年2月成立兵役署，並由上至下組建各級兵役機構，再通過各地區、鄉、鎮直至基層的村、保、甲完成徵兵動員，然在徵兵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弊端和貪腐行為，卻嚴重傷害了民眾的感情和對國民黨執政的信心，成為國民黨日漸失去民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戰時役政的弊端表現多多，首先是服役者來源的不平等。按照《兵役法》的規定，曾在高中以上學校畢業或在官、公機關服務者，均可免服或緩服現役。“以此之故，一切達官顯宦與富有資產之人，其子弟實際上便可免除現役或緩服現役，以此等子弟實際上大率具有以上資格也。”^㉕服兵役者多為平民百姓子弟尤其是農家子弟，而上層人士的子弟多半逃避了兵役。對此，社會輿

論早有反應。還在 1938 年 12 月，國民參政會即提出改善兵役法建議案，認為“有資產與有政治地位者之子弟，罕有服兵役者，社會漸感不平。”1939 年 1 月，國民黨中央黨部“以總裁名義，分詢各中央委員有無子弟服兵役，並督促各中委以身作則，率先送其子弟服役。”但在 1 月 11 日召開的國防最高會議上，對王世傑所擬“中委及簡任以上官吏之子弟率先服兵役”的建議，主持會議的行政院長孔祥熙和參加會議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均反對，未及通過。”^③可見役政腐敗之緣由還在國民黨自身，如此私心自用，何以能服眾？國民黨高層既不能率先垂範於前，則役政腐敗繼之於後亦不可避免。

其次，在實際徵召的過程中，兵員最廣大的來源是農村，而農村役政多為地方豪紳所把持，不能實行平均、平等、平允的徵兵原則，結果使“役政舞弊甚多，有錢有勢者，雖丁多不敢過問，只向無勞力之肥戶強拉，但納賄即行私釋，結果乃收捕窮弱分子之單丁獨子，或攔拉行人，以充應徵數字而塞責”。^④地方官員在徵兵過程中的舞弊行為花樣百出，如在分配兵額時故意虛報、增加名額，以勒索富戶出錢；再如壯丁被徵後，在體檢時讓有錢人家出錢賄賂，即可以體檢不合格為由緩徵。無錢無勢的窮人，只能被迫外出，躲避不合理的徵召，結果就出現為了完成徵召任務而強行拉伕等抓壯丁的現象，不少本不在被徵之列的老弱病殘幼亦不能免。在徵兵過程中，上至各級負責官員，下至鄉鎮保甲長，克扣貪污、敲詐勒索、收受賄賂、徇情舞弊等腐敗行為所在多有，乃至成為普遍現象。

抗戰時期，當兵入伍本為抵禦外敵入侵、保家衛國而戰，理應得到應有的尊嚴和待遇。但戰時被徵的壯丁，常常是“衣不得暖，食不得飽、有病無醫”，甚而沒有起碼的人身和人格尊嚴，被折磨虐待者不在少數，受虐致死者亦非少見。以致每遇徵兵令下，“人心惶惶，輿情鼎沸，咸視服役為畏途。有避而夜宿荒野者，有逃徵而跌傷者，有遷移外省者，甚有持械拒徵者，又有被徵丁之父母扭毆保甲索子拼命者，或於送丁時妻兒牽衣攔道哭阻，種種險象慘狀，實難枚舉”。^⑤蔣介石曾當面訓斥兵役署長程澤潤說：“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饑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兵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徵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⑥所以蔣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⑦

不僅僅是徵兵的弊端，戰時國民黨軍隊的腐敗表現在各個方面。如部隊中普遍的吃空餉，即虛報士兵數額冒領並貪污其餉糧。據王世傑記載，“各師兵員無一足額者，而且多數不足法定半額。但中央餉款均照足額發給，故師長、旅長、團長無人不中飽，……中飽之餉則每每為法定收入之數十倍！此一現象甚可慮。”1944 年 7 月陳誠接蔣鼎文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他也告王世傑，第一戰區“名為一百五十餘萬人，實則官兵不過六十餘萬人，即此可見軍隊空額之多。”^⑧蔣介石亦承認，“我前方部隊兵額之空虛，已為全國皆知之缺點。各級層層欺蒙，不一而足，至有一師之中缺額至三千人以上者，亦相率視為故常。平時領一師之餉，臨時不能作半師之用，及至事後申報戰役經過，則又任意浮報，動稱一師死傷五六千人”。^⑨

除吃空餉外，部隊將領中普遍存在的弊病還有，欠餉（短則一二月，長則半年，甚而有欠餉長達一年者），^⑩走私（高級將領假搶購物資為名，行公開走私之實），經商（或與商人合股，或直接派員經營，或以公家運輸工具包運私貨），賭博（輸贏動輒數萬乃至數十萬元），盜賣公

物（如汽油騾馬以及武器彈藥米麵等等）等。^④因為國民黨的“黨軍”體制實為“軍黨”體制，軍常常凌駕於黨和政之上，本已軟弱無力的黨政監察體制無法干預軍隊政務，而戰時部隊的特殊性，更使部隊高級軍官脫離監督，中高級將領的貪腐行為越加嚴重。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感嘆：“今日軍隊團長以上，大多數投機，獵官、發財、享受、腐化，無怪團長以下不努力，訓練士兵作戰，安得有成績，此誠嚴重問題”。^⑤以如此腐敗之役政，不僅不能訓練軍隊成為有思想有信念、能殺敵報國、不惜犧牲的忠勇之師，甚而不能保證部隊起碼的戰鬥力。

1944年4月，日軍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的大規模攻勢，第一戰區蔣鼎文、湯恩伯部在河南接戰後幾一敗塗地。河南省臨時參議會公開發表通電，痛責湯恩伯“好貪而不練兵，干政而不愛民，民不堪擾，有‘寧受敵寇燒殺，而不願湯軍駐紮’之諺。”軍風紀第二巡察團則報告，“此次豫戰，我軍士氣沮喪，紀律廢弛，惰將驕兵，聞敵即逃。指揮官毫無部署，械彈沿途拋棄，觸目皆是，團長以上，均應撤辦。”^⑥國民參政員“紛紛責問軍事當局，以此次為最烈，而尤以國軍在河南作戰不力，湯恩伯等未受嚴厲處分為責難之中心。”^⑦

對這些外界嚴厲批評而又無可迴避的令人難堪的情形，蔣介石也不能不承認並追責。1944年7月，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整軍會議訓話時說：“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得失敗！我們軍隊裡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後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後來人馬疲乏了，終於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裡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姦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能做人？尤其叫我個人怎樣對人？”^⑧追責的結果，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被撤職，副司令長官湯恩伯被撤職留任。然“撤職留任”，實際等於未追究責任，在外界看來，蔣介石“對於首負河南軍事責任之湯恩伯，庇護周至。”王子壯評論說：蔣對湯“顯然不欲論是非而護其私。如此作風，真難與天下人以誠相見，且其影響絕不同平常，以領袖之地位，而為此小人以損信用，深為扼腕者也。”^⑨

役政腐敗的普遍性和嚴重性，僅是抗戰時期國民黨腐敗程度加劇之一例。就戰時而言，國民黨官員的腐敗案不僅多發而且高發，其手段各種各樣，如購買軍火收取傭金，利用差價套取外匯，投機倒把發國難財，走私販私囤積居奇，侵佔盜賣國家資產，勒捐攤派獲取資財，賄賂公行買官賣官，等等，花樣百出，不一而足。據黃維告唐縱，“今日如規規矩矩拿薪水，便要餓飯，而且不能做事，勢必失敗不可，反之，混水摸魚，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好佔些油水，倒是人人說聲夠交情，有了問題大家包涵。這是做好不好，做壞倒好，正義掃地，是非顛倒。言之不勝慨然。部隊如此，機關何嘗不是如此。”具有廣泛情報來源的戴笠則稱，“在東南走私經商的不是黨政機關就是軍隊，而純粹商人走私經商已不容易了，這是實在的話。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敗壞，自上而下，所有經濟政治軍事全都壞了，欲圖挽救還是須要自上而下。如果不能徹底有所改革，社會真是不可收拾。”^⑩腐敗現象從當時口耳相傳的民謠中亦可窺其一斑：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前方有什吃什，後方吃什有什；前方一身流血，後方滿口流油。^⑪各種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腐敗案件，當時被輿論公開揭露者即不在少數，也有少數因此而下獄甚而被處死者，^⑫而沒有被輿論揭露者則又不知凡幾。這些案件的影響未必在其本身，而在其不斷消蝕著國民黨的統治基礎，不斷使國民黨失去民心，也就使國民黨統治的衰退日漸成為無可挽回之事實。

孔祥熙貪腐案及其處理

國民黨當政後，孔祥熙因其與國民黨的歷史淵源及其與蔣介石的姻親關係並隨時聽命於蔣而深受蔣的信任。全國抗戰時期，孔祥熙先後擔任行政院院長、副院長並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雖於抗戰財政不無貢獻，但他在這些位置上，利用權力為個人謀利，到底有多少款項通過上下其手，化公為私，進入其私人腰包，或許已經是筆糊塗帳，但數目恐不為少。而且孔祥熙不僅個人貪財，其家族、親信、手下亦有不少人利用與他的關係發“國難財”，道路傳聞，引起世人側目，成為國民黨內外輿論批評的焦點人物之一，不僅對孔祥熙的個人聲望，而且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官聲民望，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⑤據傅斯年觀察，“抗戰以來，政治上有一甚大之危險，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急遽左傾是也。……而問其故，其答語幾若一致：‘蔣先生領導之軍事是無可議的，而中央之政治卻並無出路。’若與之辯，則必舉例曰：‘若孔氏者，非貪污腐敗之結晶乎？’……且此評價不特在一般民眾中為然，即文武百僚，亦多心懷此意，私下議論，而不敢昌言耳。”^⑥即便是在國民黨高層中，因為孔之貪腐作為和庸碌無能，對孔持批評態度者亦不在少數。

1941年12月，因傳聞的孔二小姐（孔令偉）飛機運狗案，致民意洶湧，輿論紛紛。後來雖然證明傳聞不盡其實，^⑦但卻引起昆明西南聯大和貴州遵義浙江大學等校學生發動倒孔遊行，要求孔祥熙下臺。^⑧此事令蔣介石甚為惱怒，他致電在昆明主政的龍雲，提出“此次學生示威遊行，決非偶然，必有人從中煽動，意圖搗亂，實應特別注意，不可忽視”；“應依照戰時治安法令，切實執行紀律，勿稍寬假。”^⑨蔣介石還認為此事可能有共產黨背景，^⑩提出“對各大學共黨惡化分子應作肅清之整備”，“各大學校長與教授應徹底整頓”。^⑪經過此番風波，孔祥熙的內外聲望更為低落。^⑫王子壯評論說：“吾人並不認為一切問題全在老孔，但像老孔這樣不知自愛，青年中認為係彼等之對象，吾人又如何能為之辯護，結果必影響本黨前途極巨！”^⑬

其後爆發的美金公債舞弊案，使蔣介石再也無法維護孔祥熙的地位和形象了。

1942年3月，中美簽訂協議，美國給中國5億美元貸款，以支持中國抗戰，這也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獲得的最大一筆外國貸款。隨後，國民政府財政部決定以此為擔保，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公債”，以“平衡預算，穩定物價，健全金融，吸收游資”。^⑭但是，普通人的收入有限，難有餘錢購買公債，有餘錢的豪紳富賈專注於搶購物資，囤積居奇，而且在嚴重的通貨膨脹形勢下，公債收益的未來預期不佳，所以發行狀況並不好。然而，這種情況卻給孔祥熙及其下屬謀財提供了機會。當時美元和法幣的官方定價為1比20，但有價無市，黑市比價遠超官方比價。如果以官價購入債券，再以黑市價售出，無疑存在巨大的牟利空間。孔祥熙的下屬、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呂咸請示孔祥熙，提出由央行職員購買部分未售出的該項公債，得孔同意。這樣，孔祥熙和央行部分官員可以利用官價與黑市的差價拋售買得的該筆公債，大賺其錢，其獲利之豐可以想見。

俗話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牽涉到央行眾多官員的美金公債舞弊案，也如紙包不住的火，逐漸為外界所知，並引起強烈反彈，聲討貪官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且矛頭直指孔祥熙，不能不引起蔣介石的注意並著手處理，因孔祥熙貪腐傳聞對國民黨執政地位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何況孔在國民黨內外的形象本就不好，蔣有意以換孔的方式穩定內外形勢，但採取了漸進和內部的方式，可見蔣對孔還是有所偏愛，不願對孔驟下狠手。

1944年5月，孔祥熙“鑒於社會人士之責難”，向蔣介石提出辭呈。蔣囑陳布雷“將原件退

回並慰留。”蔣還問陳，“外間對孔之輿論如何？”陳布雷告蔣，外界普遍批評孔做生意。蔣未表態，陳布雷認為，“委座沒有徹底改革決心！”^④國民黨元老丁惟汾認為，“抗戰日久，困難叢生，弊竇百出，耳目所接，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會上反感日滋，的為事實，若一窮究竟，與負責當局均有若干之關係。如蔣先生不以親屬當政，公私猶易分明，謗怨之集，當為稍差。”^⑤

1944年11月，蔣介石下令免去孔祥熙擔任了11年的財政部長職。其後，美金公債案的內情逐漸浮出水面。1945年4月中旬，通過研究有關報告，蔣介石覺對此案“已得要領”，“已有頭緒”，但又因事涉孔祥熙而感覺“煩悶痛苦，不知所止”。在其後召開的國民黨六大上，孔祥熙在中央執行委員候選人中得票最低，並在常委選舉中落選，蔣介石不禁感嘆，“其信望墮落至此，猶不知余往日維持之艱難也，可嘆。”^⑥孔祥熙的人望既如此之低，蔣介石已很難維護。6月1日，蔣介石決定改組政府，由宋子文接其任行政院長，翁文灝接孔祥熙任副院長。^④唐縱認為，“孔之下臺為國人公認之快事”。^⑤

在蔣介石的命令下，正在美國滯留的孔祥熙，於1945年7月8日返國至重慶。11日，蔣介石召見孔祥熙，“告以此案調查經過與事實及人證物證，囑其好自為之。彼猶不肯全部承認也”；“直將人證物證與各種實據交彼自閱。彼始猶指誓強辯，令人痛心，殊愧為基督徒矣。余再以嚴正申戒，彼始默認，余仍囑其設法自全，乃辭去。”^⑥正值此時，國民參政會四屆一次會議在重慶召開，參政員陳庚雅、傅斯年等聯名提案，要求對美金公債舞弊案“迅予徹查明確，依法懲處”^⑦

美金公債舞弊案的涉案金額高達1,660萬美元，佔該公債發行額度的六分之一，礙於輿情洶湧，蔣介石不能不查辦。7月13日，蔣介石約見孔祥熙，據蔣自記，“彼總想口辯，掩飾為事，而不知此事之證據與事實俱在，決難逃避其責任也。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恥之至。”14日，孔祥熙在和蔣談話中，“承認余之證據，並願追繳其無收據之美金公債全歸國庫也。”然過後孔“猶不願承認也”，並將蔣“所交閱之審查與控案，而反示原審查人，其心誠不可問矣。”蔣感嘆“庸之圖賴如前，此人無可理喻矣”；“更覺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⑧

7月24日，蔣介石下令免除孔祥熙最後一個重要任職——中央銀行總裁，並稱“庸人不可與之再共國事矣，撤孔之舉猶嫌太晚矣”；“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⑨考慮到美金公債案在外界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蔣介石不能不對負有主要責任的孔祥熙作出一定的處理，而格於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他又無法對孔祥熙痛下狠手，最後不過是循正常途徑免去孔的職務了事，而未予本應有的刑事處分，也未給予任何應有的黨紀政紀處分或其他追責舉措，最後的結局實為不了了之。難怪徐永昌這樣寫道：“中央銀行等乘黃金提價而舞弊案，覺到國家所受打擊較之廣西失陷為甚，此一案蔣先生不能使貪污小人受到應得之法律制裁，則國家前途絕無善望”；“在蔣先生之政治下奢侈貪污似無法免除，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⑩

以美金公債案和其他貪腐案為表徵的國民黨各級官員貪腐之勢的形成，與蔣介石亦大有關係。如徐永昌所言，“孔誠貪黷惡國，……追溯其由，蔣先生似不能辭其咎。”^⑪蔣介石在任用官員時，往往是任人唯親，以聽話而非能力為優先考量，重用親人、同鄉、學生等。吳鐵城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王子壯評論為：“蔣先生之用人，但期服從，不論工作，如吳鐵城之任秘書長是其例，對上能服從，其下不知包庇多少貪污。”吳鐵城還在某次宴席上，“酒酣耳熱，得意忘形，乃發表其從政之心得，大意現在世界上工作者，應洞徹其要竅，蔣先生為吾國的領袖，應依領袖是依歸，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可，只要能取得領袖之歡心，一切事都可以作通，否則，

埋首工作亦無益也等語。”王子壯感嘆說：蔣“受左右之包圍，狡黠者則謀逢迎鑽入，以資憑藉，可以假借聲勢，以自徒利，如吳鐵城輩是也。”⁷²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莫不如此。蔣介石的用人之道，造成國民黨官員講究裙帶關係，熱衷派系鬥爭，如此執政方式，既不利於國民黨統治的穩固，也加劇了戰時國民黨統治力的衰退。用人無當可謂政治腐敗，而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故傅斯年有言：“欲矯下層之弊，仍必先澄上層之源。上層之弊，未可直言其貪污，然失官箴之處，則甚矣！以影響論，直接性之貪污，為害固遠不逮間接性之失官箴。”⁷³王子壯認為，“此種腐敗現象，真為革命之對象，二十年前余等高呼所欲打倒者，不意今竟一一實現於目前。”⁷⁴唐縱認為，“本黨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黨外的反感，亦且失了黨內的同情，如果沒有顯著的改革，全國人心將不可收拾。”⁷⁵

全國抗戰期間，國民黨退居後方，原有的抗戰信念受到持續戰爭的磨蝕，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效率低下、組織渙散、派系矛盾等等不利其統治的負面因素日漸增長，統治力和影響力與中共恰成此消彼長之勢。對此，即使是國民黨內部也有所反思，認為如此情形只能毀壞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在1945年4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不少代表痛斥貪污腐化，但蔣介石出於維持國民黨統治及其個人權威的需要，仍極力迴避日趨普遍和嚴重的國民黨官員貪腐事實，甚至認為揭露腐敗是別有用心，指責國民黨有人“毫不分辨，人云亦云”，“反動派說我們政府貪污，我們不察事實，就跟著攻擊政府”。⁷⁶其實，蔣介石未必不知道官員貪腐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他在私下對此亦不無憂慮，對某些貪腐官員甚至是孔祥熙也有所告誡或處置。但他由其主觀立場出發，顧慮揭露腐敗對國民黨統治的負面影響，尤其擔心在抗戰即將勝利、國共矛盾和鬥爭可能激化的時期，揭露腐敗將不利於國民黨統治的穩固，因此對腐敗問題多半採取睜一眼閉一眼、聽之任之的消極態度。⁷⁷在蔣介石的態度影響下，全面揭露官員腐敗在國民黨內勢所不能，且不得及時處理，而外界輿論對腐敗的揭露則又力所不逮，且受到壓制。在既缺乏黨內監督、又不能發揚黨外監督的情況下，國民黨官員的貪腐問題只能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嚴重，在抗戰勝利後，迅速進入其惡性化發展階段，並且最終成為導致國民黨統治垮臺的重要因素。

國民黨六大與派系之爭

1944年，國民黨主導的正面戰場在日軍大規模攻勢下喪師失地，日軍一度進至貴州獨山，重慶震動。由此激發輿論對國民黨執政當局的強烈批評，有人認為，“這便是八年來內部腐爛的後果，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空前的危機！”⁷⁸要求改革的民主運動因此而獲得新的動力，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呼應和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民主派的支持，甚而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也多次發聲，提出民主改革主張，⁷⁹引起蔣介石的極度惱怒，大罵孫科“詆毀政府無微不至，其用意奪取國府主席後與共黨合組政府，以俄國為其後臺老闆，鞏固其賣國地位。此人實汪逆之不若也，余決以忍痛處之，置之不理”。⁸⁰由軍事失利而致社會動盪，再由社會動盪傳導到國民黨執政集團的心態，不能不影響到即將召開的國民黨六大，激化其黨內紛爭和派系之爭，對國民黨統治力的衰退更是雪上加霜。

1945年5月5日至21日，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時值納粹德國投降，日本敗象日顯，國民黨六大既為總結抗戰歷程，籌謀戰後處理，更為集合全黨力量，與日漸崛起的中共競爭，力圖繼續維持其執政的壟斷地位。大會各項報告和決議雖然突出了爭取戰爭勝

利的主題，然其重點卻落在如何因應勝利後的局勢。大會決議在當年召開已多次延期的國民大會，但又規定將要提交國大討論的憲法“仍應以國民政府公佈之五五憲法草案為討論基礎”。^⑧大會通過決議，一方面指責中共“仍堅持其武裝割據之局，不奉中央之軍令政令”；另一方面又表示將“在不妨礙抗戰、有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⑨大會還提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保障佃農，扶植自耕農”等政策主張，但實際上卻難以落地，與過往類似宣示一樣，成了花瓶式的應景擺設。大會決議提出的“凡有獨佔性之企業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均歸國營或公營”的主張，^⑩又成為國民黨加強經濟壟斷、發展國家資本（實為外界強烈批評的官僚資本）的理論張本。國民黨執政多年，其政策主張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政策，而是言大於行，國民黨六大亦然，俟大會結束，這些貌似美妙的高調政策宣示，多半都被束之高閣了。^⑪

其實，國民黨六大真正的重頭戲不在這些政策宣示，而在“大會自始至終，注意選舉問題。”^⑫自1935年國民黨五大召開以來，國民黨10年未開黨代會，其中央領導層中，有人投敵，有人頹唐，有人逝世，有人老邁，也有不少新人上升到重要位置，客觀上形成中央領導層的年代更替和激烈競爭，再加以國民黨內複雜的派系之爭，老派系如CC系對組織的把控及其影響依舊，新派系如三青團系對掌握更多的權力躍躍欲試，以黃埔系為中心的軍人集團因為戰爭之故話語權大增，圍繞在蔣介石身邊並為蔣寵信的政學系官僚集團、侍從室秘書幫、情報系統，還有另立門戶的孫科“太子黨”集團、桂系等地方派系，都希望通過選舉分一杯羹，而那些具有反清反北洋軍閥、與孫中山共有“革命”資歷、盤踞黨務監察系統的“老人”，也不甘心被邊緣化，等等，這些因素無疑更加劇了這次中央委員會選舉爭奪的激烈度。個人謀求更高地位，派系謀劃更大發展，尤其是在國民黨內複雜的派系之爭背景下，各派系都期望能在選舉中擴大己派力量，削弱他派力量，致大會選舉矛盾重重，衝突不斷，過程甚為激烈，結果卻使各派都不甚滿意。

作為國民黨的獨裁領袖，蔣介石的總裁地位無人可以挑戰。^⑬5月17日，由于右任主持，主席團提請選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經吳稚暉說明提案旨趣，無競選人者皆用推選方法產生，“於是全場起立拍掌互數分鐘，歡呼致賀，作為通過。”^⑭總裁“選舉”並無懸念，真正熱鬧的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尤其是執行委員會的選舉。

還在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國民黨內各派系對中央委員會的名額及其分配和產生即有不同意見，並形成激烈的鬥爭。“名額問題有數主張，一主原來二百六十名，現在死亡者達五十三名，只依原額產生即可，一主因為戰爭關係，應酌加擴充，以待有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因首當其衝，應付困難，提出兩點意見，一依照黨員名額之增加，現在較五次代表大會時約有八倍，……現從節約計算，亦應擴充為千五百名，一則因為現有總裁負責，由彼選人擔任若干工作，毋庸有中央委員之設。”^⑮

與過往國民黨黨代會選舉多半操縱在組織部系統即CC系手中有別，對於這次大會選舉，黃埔系和三青團系頗為積極。黃埔系軍人將領得益於戰爭期間的權勢擴張，三青團少壯派則依託蔣經國為中堅，他們都頗思在選舉中有大的斬獲。還有自CC系分離而出的朱家驊，對其組織部長被免頗為不滿，也支持向CC系“二陳”（陳果夫、陳立夫）奪權。^⑯“二陳”則極力企圖維持在組織方面的壟斷地位，會前曾組織到會中委及各地代表二三百人開會，要求“必須統一意志”，“最後歸結到絕對服從，不得自由活動。”再加上那些無特定派系的代表中，“想活動中委者太多也。……至各方代表之有金錢者，多來此活動，優給旅費，大事招待”。^⑰這些都使得大會選

舉成為各方矚目之焦點。

經過一番激烈的明爭暗鬥，5月10日，國民黨六大通過蔣介石提出的中央執監委員選舉辦法，總額為360名（執行委員160名，候補執行委員80名，監察委員80名，候補監察委員40名，總數較五大增加100名）。不過，這個方案提出的委員名額不能滿足國民黨內許多人的“競選”欲望，他們紛紛提出增加名額的要求，使蔣介石為此“最感痛苦”。^④無奈之下，19日選舉當日，蔣介石又決定將選舉總額擴大為460名（執行委員222名，候補執行委員90名，監察委員104名，候補監察委員44名），其中五屆中央執監委員為當然候選人，其他為自行報名和總裁提名。^⑤黃埔系和三青團代表疑蔣之決定“全出果夫立夫在組織部預謀操縱者，故竭力反對，並有共同退席之組織與準備。”儘管蔣介石親自主持選舉會，但當他提出增加名額時，“仍多表示反對者”。蔣介石只能以其領袖獨裁的最後決定權，將是否增額案付表決，終獲通過，但反對票仍超過200張。蔣不能不感嘆，“如余不親自主席，則今日選舉必無結果，若爾則大會全為康澤等敗類所破壞矣，可痛之至。”^⑥

中央執監委員產生的最後一步是大會選舉，蔣介石裁定採用兩種辦法，由參會代表自擇其一。甲案為在800人的候選總名單中選出460人，乙案為在蔣介石提出的480人名單中選出460人。同時採用兩種選舉法，也算是各類選舉中的“奇事”了，而且可以想見，在800人的名單中圈出460人，將是多麼耗費時間、精力乃至眼力的事，“結果大多數代表採用乙種選票。選舉時，秩序不甚良好。”^⑦蔣介石在主持選舉時，提出當選原則應著重考慮有功“黨國”而善於領導者、曾被敵奸捕獲勞苦有功者、教授及工界有能力者以及前幾屆中委，並提出“有罪”者如張學良、楊虎城、劉蘆隱，未參會者如王樹翰，老病者如劉鎮華等可不選，40歲以下者亦當慎選。^⑧選舉結果，在新當選的460名中央執行和監督委員中，未投敵的五屆中央執監委員多半重新當選，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包括不少軍方和三青團系的人選，這與他們在會前的私下運作也大有關係。王子壯對大會選舉有如下總結：“蔣先生對黨雖有原則而無細密之方法，取人用才，多依意為之，未暇詳細考慮其後果”；“黨人失望，向心力日減，則將來於合力以對各黨各派有不可能者，此今日黨的真正危機之所在也。”^⑨

國民黨六大選舉結束後，國民黨內對選舉多半持批評態度。陳布雷寫道：“念此次大會競選中委情形之惡劣，甚為本黨恥之，亦為本黨前途憂之”；“此次選舉中各部分猜疑過甚，互信消失，糾紛怨望，無所不有，真堪浩嘆！”^⑩陳克文認為，“六全大會選舉的結果，各方面似乎都不滿意。黨外的人知道了選舉的實情一定更加非笑，甚或引以為攻擊本黨不民主的口實。”^⑪唐縱記載，“六全大會結果，外間反應甚劣！”^⑫徐永昌亦記載，“外面對此次大會選舉一事十之八九不滿，落選者固謠傳百出，選出者亦各不滿其所不滿”，以至不止一人對徐說，“國民黨從此告終”，“國民黨已完”。^⑬蔣介石也不無悲哀地寫道：“局勢至此，可謂紛亂與惡劣極矣，而又以各處人事與黨政軍各種業務無一不呈頹廢與衰敗自亡之象，愧悔無已。”^⑭

國民黨歷來的頑疾之一便是派系之爭。全國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派系之爭在日本侵略威脅中華民族生存和國民黨統治存續的大背景下有所收斂和克制，但是，在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的國民黨高官中，粵系身影及其與蔣介石的恩怨仍然隱約可見。及至國民黨六大的選舉，選前勾心鬥角，選中沸沸揚揚，選後各方不滿，不僅沒能選出一個有凝聚力、向心力、領導力的中央核心領導集體，反而因為選舉中的派系之爭和矛盾糾葛，渙散了黨心和組織力，使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的核心領導作用更不能得到充分發揮，其統治力更為衰退，並很快表現在戰後的國共之爭中。

國民黨統治的衰退與中國政治格局的變化

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戰爭開始後，當時人已經認識到，“中日戰事自開始之時，即已非中日二國單純之比力”，^⑩而是牽涉到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文教、社會等全方位的全面性戰爭。這樣的全面性戰爭，勢必帶來相關各方面的格局變化，當時人也認識到，“一年多的抗戰，使得中國大變了。這個刺激既深且廣，雖然從前的許多弊端一時尚不能改正過來，進步則可謂異常迅速。戰事也許不如意的地方尚多，但也出乎意料之外，支持一年後更顯得堅強。看了這個現象，中國的前途尚極可樂觀。”^⑪

時人對“極可樂觀”的前途判斷，建立在“中國大變”的前提之上，實際則反映出戰爭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正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罔顧歷史與現實，狂妄地高估自己，嚴重地低估對手，悍然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從而大大激活了深藏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強烈民族情感，並轉化為團結一致、決不屈服、堅定抵抗外敵入侵的精神力量，使中國以弱國之力而抵禦強敵入侵，持久堅持，最終削弱了侵略者，拖垮了侵略者，戰勝了侵略者。到1945年春夏之交，無論是重慶和延安的抗日陣營，還是南京的敵偽陣營，都沒有人再懷疑日本的敗亡結局，而日本敗亡之後中國向何處去，正日漸成為國人關注的中心問題。

中國向何處去？決定於國內的力量對比。全國抗戰開始之後的八年，國內力量對比最顯著的變化，是國民黨地位的相對衰落，共產黨地位的明顯上升，而且在1944年豫湘桂戰役正面戰場連連失利之後，這個變化的徵象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可為時人感知。著名作家沈從文寫道：“最顯著變化，則為同事中有於一夜間忽然左傾者。亦有從不對於政治有所活動，忽成為活動中心者。”^⑫為蔣介石操刀寫作的文人陶希聖則認為，“一年多以來，中國共產黨以‘民主、團結、抗戰’宣傳於國內外，頗收成效。”^⑬所以，1944年底，中共中央在分析形勢時指出：“最近八個月，中國政治形勢起了一個大變化。國共力量對比，已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並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我黨現在已確實成了抗日救國的決定因素。”^⑭

全國抗戰開始後，國民黨曾經提出“抗戰建國”，作為戰時的基本政治路線和施政中心。但是，八年過去了，國民黨的統治卻在明顯衰退，建國難期其成；共產黨的影響還在節節上升，建政大有收穫。何以致此？作為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也不甘心於自身地位的下降，也圖振作復興，然其欲挽救而無力，則又確實反映出其自身存在的諸般問題。蔣經國認為：“工作中心沒有將廣大群眾的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利益，作為重點，而中國革命變了質，專為刮農民的、吃農民的之各種設施。”^⑮唐縱認為：“目今黨何以不能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黨的上層幹部，對於主義政策的認識，並不徹底。由革命到取得政權，思想和觀念已為之大變，現在大家的觀念是現實問題。上級幹部在追求權位，下級同志在追求生活。主義、政治、革命，都已忘卻了，消失了！”^⑯所以，國民黨內也有“革新”的強烈呼聲。但是，國民黨地位的衰落，事關其階級基礎、組織結構、幹部群體和利益格局，非小打小鬧的“革新”所可解決，而“刮骨療毒”式的“革命性變革”又無異顛覆其統治根基，故非不為也，乃不能也，這也就是所謂歷史的大勢吧！

正因為中國政治格局的變化向著國民黨低落、共產黨崛起的方向演進，使得越是臨近抗戰勝利，對於戰後政治的走向和預判，共產黨越是樂觀而進取，擁有執政地位和更多資源的國民黨倒反而瀰漫著濃重的消極悲觀情緒。閻錫山認為，“本黨之危機甚大，如共黨的發展與我之危機成正比例（假使本黨與共黨易地而處，早被共黨解決），國共不並存，政治解決不可能，軍事解決

有顧慮。”⁹⁹熊式輝認為，“平素責人之自私腐蝕黨者，今竟同流合污以自私，且腐蝕及其自身，黨之前途可知矣，此輩人定將一搖身而變成黨的附骨之疽，在黨內自己暗鬥會有餘，去黨外與共產黨明爭則不足，我不怨人，我只惜黨，改造之運動不成，黨之氣數盡矣。”¹⁰⁰陳布雷認為，“黨之無能，無力擔負此艱巨任務。……總裁有意改組黨，但恐無能為力。”唐縱認為，“共產黨的攻勢甚銳，氣勢迫人，令人惶恐不安。”出身特工系統、在蔣介石身邊任職、掌握各種情報來源的唐縱，基於對國民黨的深入觀察，已經預計到未來中國“可能性最大”的結局，“就是國民黨垮臺，共產黨當政。”¹⁰¹

面對這樣積重難返的局面，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雖然有心改變但亦無從下手。唐縱和王子壯在1943年11月不約而同地記載了蔣介石對國民黨無力解決自身問題而面臨困局的傷感與無奈！唐縱記載，陳布雷告他，“委座對於黨團不能有所作為，甚為不滿，看報告都是好的，沒有人自承弱點，但是實際成效一點也沒有，言時非常傷感！……當年滿清腐化，所以本黨革命得以推翻其政權，今本黨黨員，成了當年八旗子弟，眼望自己的腐化，不勝痛心！言下感慨系之！”¹⁰²王子壯記載，蔣介石“對於所謂最高幹部有嚴厲之責斥，甚至浩然長嘆，謂看到這般人即想起清末之‘皇帶子’，並非不努力，而實際則無進步，如果長此下去，不但死無葬身之地，且亦將‘生無葬身之地’。”¹⁰³

國民黨地位的下降，中共地位的上升，帶來了中國政治格局的變化，是全國抗戰時期國內政治演進最大的變化和最重要的結局，然其影響更多是在抗戰勝利以後，更多決定了戰後中國政治的走向，但追根溯源，這樣的變化則奠基和發展於抗戰時期，是國共兩黨在抗戰期間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諸般不同的政策運籌和實施的結果。由抗戰時期國民黨執政的種種弊端及其解決無道，或可體會國民黨統治衰退的不可避免。

①本文中的“戰時”“抗戰時期”“全國抗戰”等概念所覆蓋之時段，是指從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這段歷史時期。

②有關戰時國民黨政權的衰退問題，在相關通論性著作中有所論述，但有深度的專門性、綜合性研究似不多見。本文所涉之蔣介石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在戰時的貪腐問題、國民黨六大、國民黨組織等主題，學界已有若干研究，請參閱楊天石：《抗戰與戰後》，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鄭會欣：《讀檔閱史：民國政事與家族利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邵銘煌：《為抗戰勝利而綢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開與時代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劃時代的歷史轉折：“1949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等。

③陳之邁：《中國政府》第1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年，第150～151頁。

④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下冊，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218頁。

⑤林美荊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1943年5月29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上冊第510頁。

⑥《國民政府公報》，1943年5月29日。

⑦《王世傑日記》，1943年7月2日，上冊第518頁。

⑧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43年8月4日、7日、9日，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第418～419頁。

⑨《王世傑日記》，1943年8月21日，上冊第529頁。

⑩《王世傑日記》，1943年8月28日，上冊第531頁。

⑪《國民政府公報》，1943年9月15日。

⑫英美輿論對國民政府主席職權因人設事亦持批評態度。“美國輿論對於蔣先生擔任主席，即修正國府組織法為負責實際責任之主席，頗表不滿，因人而改法，

- 將來他人任主席，必又將修改。”（《王子壯日記》，1943年11月1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1年，第8冊第439頁）青年黨領導人李璜則注意到，蔣當選後“各地慶祝情形，亦無真誠熱烈之感，比諸羅斯福獲選及連任時各國狂歡熱烈之情相差太遠，蓋一般觀感，認僅為一種照例文章而已。”（《中統局關於青年黨在四川活動的情報》，1943年10月2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2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政治〔三〕第306頁）
- ⑬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1944年11月25日，台北：“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2015年，第665頁。
- ⑭《徐永昌日記》1944年4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第7冊第286頁。
- ⑮《王子壯日記》，1944年4月24日，1945年6月（上月反省錄），第9冊第165～166頁、第10冊第224頁。王子壯身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工作，對蔣為政之瑣細低效有切身體驗。在蔣身邊工作多年的陳布雷則感嘆，“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事事要親自處理，個人辛苦固所不辭，但國家大政，不與各主管商定，恐將脫節。”（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1944年8月15日，第451頁）
- ⑯《徐永昌日記》，1942年11月8日，第6冊第502頁。
- ⑰《徐永昌日記》，1944年6月12日，第7冊第332頁。
- ⑱《王子壯日記》，1943年11月12日，第8冊第439頁。
- ⑲《抗戰建國綱領決議案》，1938年4月1日，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486頁。
- ⑳《綏靖政工手冊》，南京：國防部，1946年，丁編。
- ㉑《公務員服務法》，1943年1月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下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2～73頁。
- ㉒《非常時期監察權行使暫行辦法》，1938年8月27日，《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上冊，第323～324頁。
- ㉓郭寶平：《民國政制通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219頁。
- ㉔吳學衡：《十八年來監察工作的檢討》，南京：《中央日報》，1948年6月4日。
- ㉕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須知》，重慶，1942年，第116頁。
- ㉖《臨全大會關於確立領袖制度省取主任委員縣取書記長制度並設立青年團和對黨員進行訓練和監察之決議》，1938年3月31日，《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上冊，第11頁。
- ㉗陳之邁：《中國政府》第1冊，第70～71頁；《中國國民黨法規輯要》，重慶：中央訓練團，1942年，第295頁。
- ㉘戰前國民黨黨員受懲戒者5511人，其中永遠開除黨籍者413人，多數是因與中共的關係或為反蔣問題；戰時國民黨黨員受懲戒者3422人，其中永遠開除黨籍者1382人，多為投敵之漢奸。（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第314～315頁）
- ㉙《王子壯日記》，1941年12月31日，第7冊第370～371頁；1945年1月28日、3月27日，第10冊第39、116頁。
- 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1944年9月9日，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第8卷第309頁。
- ㉛《徐永昌日記》，1944年10月8日，第7冊第453～454頁。
- ㉜《王子壯日記》，1944年5月7日、13日，第9冊第186、192頁；1945年8月7日，第10冊第272頁。
- ㉝《王世傑日記》，1939年1月11日，上冊第174頁。
- ㉞《王世傑日記》，1938年12月5日，1939年1月8日、11日，上冊第163、173～174頁。
- ㉟陳洪進：《從四川兵役問題論農村政治的改革》，《中國農村》第6卷第5期，第10頁。
- ㊱《四川省政府訓令》，重慶：重慶市檔案館藏檔，檔號1（101）—318—1。
- ㊲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台北：“國史館”，2004年，上冊第150～152頁。在1944年夏的一次巡視中，蔣介石於暴怒中杖擊兵役署長程澤潤中將並下令逮捕，隨後在軍法審判中以利用職權、調用工兵、建築私宅等罪名判以死刑，於1945年7月5日處決。1944年10月，國民政府組建兵役部，由鹿鍾麟出任部長。但僅僅處死一個程澤潤和建立一個役政部，並不足以改變役政的嚴重弊端，程澤潤只不過是役政腐敗的替罪羊而已，程案處理後的役政腐敗依舊。

③⑧ 瞿詔華：《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台北：“國史館”，1994年，第151頁。

③⑨ 《王世傑日記》，1941年8月8日，1944年11月9日，上冊第366、651頁。

④⑩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22頁。

④⑪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第366～367頁。

④⑫ 《陳誠呈蔣介石》，1944年8月17日，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台北：“國史館”，2007年，下冊第581頁。

④⑬ 《徐永昌日記》，1939年12月1日、23日，第5冊第230、250頁。

④⑭ 《蔣介石致陳誠手諭》，1944年8月31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第584頁。

④⑮ 《王世傑日記》，1944年9月5日，上冊第634頁。湯恩伯部在河南的潰敗，牽涉到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在戰略戰術、武器裝備、情報後勤、作戰能力等方面之差距，非可歸為腐敗之單一原因，惟因本節之主旨在討論戰時國民黨貪腐問題對國民黨統治衰退的影響，故對導致湯部潰敗的其他因素未及論述，請參閱相關研究。

④⑯ 《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第150～152頁。蔣介石曾告替湯恩伯辯護的胡宗南：“軍人如做生意，一心一意在錢上打算，還能打仗麼？他上次來渝專來報告此事，謂去年已掙到一萬萬，明年可掙到兩萬萬。初聽之下，極為吃驚，實出意料之外，我說那你可以做銀行老闆，不必帶兵了”。（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1944年7月5日，台北：“國史館”，2015年，上冊第364～365頁）

④⑰ 《王子壯日記》，1944年9月9日，第9冊第363～364頁。蔣介石對湯恩伯固“庇護周至”，而湯為逃避失敗責任，個人亦四處活動，乃至賄賂公行。亦據王子壯記載，“湯氏方以在河南經營工商業之結果，挾巨金入都，媚事各方，故未聞對湯氏有若何之處置也。……惟吾國處此已臨最後嚴重之關頭，若無嚴肅之紀律，實無以示天下之大公，影響前途，殊非淺鮮。蔣先生之情報，遍及各方，對此重大呼籲之民間輿論，不能諉為全不知悉也。”“如湯恩伯部隊之擾民無力，遇敵即逃，國人皆知，豫人不分派別，皆欲得而甘心。但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用全力庇

護，……而湯恩伯每以來渝，以數百萬運動林氏及其部屬若干，如此貪污，政治焉得而不腐化，若干青年且以此視整個之政府之貪污。”《王子壯日記》，1944年7月1日、8月12日，第9冊第266、323～325頁。

④⑱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2年10月20日，1944年6月29日，第313～314、439頁。

④⑲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1年3月31日，第198頁。據王子壯記載，“觀各事務人員之豪奢，一席千元之宴會，月必數次，竟有十餘次者，其經費果何自來？”（《王子壯日記》，1943年8月28日，第8冊第338～340頁）

⑤⑩ 如成都市長楊全宇1940年12月因操縱糧價、囤積居奇被處決；又如中央信託局運輸處經理林世良1942年12月因走私被處決。林世良當的官雖不大，但卻因其特殊背景，案發後曾轟動一時。林世良為孔祥熙的親信下屬，他利用特權，通過當時唯一能夠聯通國際的西南運輸通道，倒賣運輸物資，大發“國難財”，為各方所側目，而且引發國民黨內的派系矛盾。蔣介石得報後甚為惱怒，下令逮捕林世良，並處其死刑。對孔祥熙與林世良案的關係，蔣介石曾記載，“庸之對鴉片運輸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藉藉，貪小失大，更為憂悶”。（《蔣介石日記》，1942年12月9日）

⑤⑪ 據王子壯記載，“孔夫人宋霽齡及其子女好貨特甚，廣事搜刮，醜聲四播，社會側目。參政會中迭次提出質問孔氏，均由蔣為保護，多方開脫，人以是短蔣，以其不辨是非，以護近戚也。”（《王子壯日記》，1940年8月23日，第6冊第236～238頁）據唐縱記載，知名教授馬寅初“迭次公開演講，指責孔宋利用抗戰機會，大發國難財。因孔為一般人所不滿，故馬之演說，甚博得時人之好感與同情。但孔為今日之紅人，炙手可熱，對馬自然以去之為快，特向委座要求處分，委座乃手令衛戍總司令將其押解息烽休養。蓋欲以遮阻社會對孔不滿情緒之煽動也。”結果，“馬寅初的案子，成了沙坪壩的學潮，由商學院擴大到了全校，由重大擴大到了中大。……已由學潮變成了政治上的鬥爭。”（《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0年12月8日、19日，第97、180、182頁）

⑤⑫ 《傅斯年致蔣介石》，1939年，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14年，第2卷第799頁。

⑤③楊天石：《“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道引起的學潮》，合肥：《江淮文史》，2012年第2期。

⑤④據陳布雷的記載，昆明“有大隊學生遊行，到處書寫反孔標語，皆受大公報論文影響，立言之不易如此。其實孔之誤國豈青年所能盡知”。（《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29年至31年]，1942年1月8日，台北：東南印務社[無出版年份]，第524頁）。

⑤⑤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8冊，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73～77頁。

⑤⑥據王世傑記載，蔣介石對昆明反孔遊行“甚為重視。據報有共產黨或國社黨人指使，但予所接聯大教授信，則謂係學生自動。”（《王世傑日記》，1942年1月11日，上冊第405頁）唐縱亦記載，“近來學潮愈鬧愈廣，委座對此甚為震怒，曾命康澤赴昆明調查，結果與國社黨無關”。（《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2年1月27日，第252頁）其實，此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國民黨內有不少人對孔不滿，反孔遊行背後隱約可見三青團的身影。昆明西南聯大的反孔遊行，“三青團團員參加者亦多”，該團還“開全體大會討論應付方法和聲明立場”。（《國民黨雲南省執委會關於查禁昆明西南聯大等校學生倒孔運動經過情形呈》，1942年1月16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2編，政治[五]第281頁）國民黨雲南省黨部書記長趙澍亦向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報告，此次反孔活動，“三青團團員為爭取領導權起見及避免他黨譏諷起見，參加者亦多”；“露面者大半為三青團員及中立分子”。（《趙澍致朱家驊》，1942年1月7日、15日，朱家驊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檔號35-3）蔣介石因此認為，“我青年團幹部糊塗散漫，一任反動派從中利用與之便，而昏昧不悟”。（《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3日）蔣在黨團會報中“對青年團幹部諸人，處理所謂反孔風潮之經過，複嚴行責斥。張文伯於席上極感不安，言時淚下。”（《王世傑日記》，1942年3月20日，上冊第419頁）

⑤⑦《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3日。

⑤⑧據唐縱記載，“聞為此事，委座與夫人鬧意氣者多日。自古姻戚無不影響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難矣哉！”唐縱與同在侍從室工作的陳方“談學潮問題，認為直接壓抑，不會有何效果，因為孔之為人莫不痛

恨，為孔辯護者，均將遭受責難。……有效之方法，莫若孔氏表示辭職。布雷先生曰，孔不但不辭職，而且要登報，表示病癒視事。旋即嘆曰，孔氏對朋友對領袖對親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舉。”（《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2年1月27日、28日，第252～253、426頁）

⑤⑨《王子壯日記》，1943年11月24日，第8冊第454～455頁。

⑥⑩《民國三十一年同盟勝利美金公債條例》，1942年4月25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編財政經濟（二）第471～472頁。

⑥⑪《在蔣介石身邊八年》，1944年5月21日，第432頁。

⑥⑫《王子壯日記》，1944年5月30日，第9冊第215頁。

⑥⑬《蔣介石日記》，1945年4月10日、14日、30日、5月31日。

⑥⑭張治中認為，蔣介石“尤喜獨掌大權”，他曾對蔣“面陳數次，絕不能再兼行政院長，以政務不善，責有攸歸，可易人以新耳目，今自兼將何以處理。”（《王子壯日記》，1944年11月15日，第9冊第459～460頁）

⑥⑮《在蔣介石身邊八年》，1945年5月31日，第514頁。

⑥⑯《蔣介石日記》，1945年7月12日。

⑥⑰《參政員陳庚雅傅斯年等請政府徹查三十一年同盟勝利美金公債發行餘額大舞弊嫌疑提案》，1945年7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2編財政經濟（二）第552～553頁。

⑥⑱《蔣介石日記》，1945年7月13日、14日、16日、21日、22日。

⑥⑲《蔣介石日記》，1945年7月25日、8月17日。

⑦⑩《徐永昌日記》，1945年5月5日、7月18日，第8冊第84～85、129頁。

⑦⑪《徐永昌日記》，1944年9月30日。

⑦⑫《王子壯日記》，1945年4月30日、7月（本月大事預定表）、8月2日，1946年3月2日，第10冊第165～166、269～270、532頁。

⑦⑬楊天石：《海外訪史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50頁。

⑦⑭《王子壯日記》，1945年6月14日，第10冊第206頁。

⑦⑤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年6月30日，第522頁。

⑦⑥ 秦孝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1，第112、115～116頁。

⑦⑦ 對蔣介石將反對貪腐與中共問題相聯繫而投鼠忌器的做法，國民黨高層內部也有不同看法。比較清廉的陳誠認為，“對於克制共黨最有效之方法，闕為從政治設施之實績上克服之。例如政府對於人民應做之事，不待共黨批評，政府即先去做。又如剷除貪污，應即破除情面，嚴厲實行，使青年在事實上，對政府生出信仰來，則共黨自然無所藉口，以施其技。一言以蔽之，中央及地方加緊實行三民主義，即為克制共黨唯一之要訣。”“年來賞罰不嚴，貪污不治，實為共黨對民眾尤其對青年宣傳上最有力之口實，亦即本黨政績不佳最大之原因。今後再不決絕改進，非至魚爛肉潰不止，惟此所謂決絕改進云云，尤其應特別注意者，對於貪污腐化之人員，不可僅以其反對共產之關係即重用之，蓋此輩實為製造共黨之因素也。”（《陳誠呈蔣介石》，1938年1月27日，1940年3月27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第295～296頁，下冊第433頁。

⑦⑧ 《雲南各界護國起義紀念大會宣言》，1944年12月25日，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爭》第3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下冊第1362頁。

⑦⑨ 孫科還對黃炎培說，他“主張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容納他黨。”（《黃炎培日記》，1944年5月17日，第8卷第263頁）其實，儘管孫科常常以“民主派”的面目出現在外人眼中，但究其對政治本質的認識，仍不脫國民黨人的固有思維。據顏惠慶記載，孫科“說國民黨創建了民國，它就應坐民國的天下。”（上海市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1941年10月16日，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第374頁）但是在當時環境中，孫科被認為是國民黨“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國民黨內也有支持孫科者。據王世傑記載，當蔣介石就改組行政院徵求他的意見時，王建議“不妨請孫哲生先生任院長，如副院長及部長得人，則令孫出任此席，蔣先生不必有何顧慮；且或可藉此渡過目前對蘇、對美、對共之諸種困難。蔣先生未作表示。予則再三言之。予亦知孫有若干弱點，但目前政府需要比較徹底的改組，他人均無勇氣，故予作此提議——此一提議恐尚無他人向蔣先生提出過。”（《王世傑日記》，1944年8月2日，第625頁）

⑧⑩ 《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15日。蔣介石在這段日記中的表達過於情緒化，孫科當時對外表現“親蘇”，與中共的關係尚可，但以此說他將“與共黨合組政府，以俄國為其後臺老闆”，完全是無的放矢。這也是蔣氏自撰日記的特點之一，即其日記中的表述常常是情緒化的，也因此，對蔣氏日記的解讀，尚須結合歷史實際而甄別和斟酌待之。

⑧⑪ 《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第960～961頁。

⑧⑫ 《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第921～922頁。此次大會召開期間，蔣介石曾經特意在軍事委員會宴請出席大會的軍方代表，“席間總裁指示，今後對有國際背景之共產黨，非使服從政府命令軍令，決難與謀任何合作，彼黨志在消滅本黨，宜注意防範云云。”（《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45年5月22日，第470頁）陳立夫的反共態度更為堅決。據黃炎培記載，還在這次大會召開前一年，某日陳立夫召集國民黨員茶話會，放言高論說：“現在敵人是共產黨，對共黨只有殺，我已殺了他們高級二千幾百幾十幾，普通黨員二萬幾千幾百幾十幾了，怎麼還有人說國共合作。”（《黃炎培日記》，1944年8月26日，第8卷第305頁）聽到陳立夫這樣的言論，黃炎培真是感覺不寒而慄，在情感上也更加疏遠國民黨。

⑧⑬ 《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第925～936頁。

⑧⑭ 唐縱認為，蔣介石在大會期間的幾次講話，袒護腐化分子，“頗易引起黨員之失望！”（《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年5月19日，第511頁）唐縱認為，“本黨在此次會議中完全表現為一保守性之政黨而非革命性之政黨。查其原因，國民黨黨員大部分為公務人員，此種黨員在十餘年來一黨專政的長時期中，地位提高了，財產增大了，生活優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與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動搖其自己之地位。”（《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年5月31日，第514～515頁）

⑧⑮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年5月19日，第511頁。

⑧⑯ 事實上，國民黨內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方式也不是沒有異議。據唐縱記載：孫科曾經在國民黨內的演講中“公然指斥黨內之不民主”；提出“苟能在黨內開放言

論，黨部自由選舉，縣議會選舉，總裁對於事權放鬆，如此亦可平抑人心。”CC系人物徐恩曾、潘公展、葉秀峰、程天放、張道藩、余井塘等，亦“痛恨黨無能”，對於組織無法施展，頗為痛憤，甚至希望總裁對於領導方式有所改革。”（《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4年4月13日、25日、5月19日，第424、426、431頁）但是，這些異議當時還不成氣候，不能形成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真正挑戰。

⑧⑦《吳委員敬恒對於選舉總裁案說明原文》，1945年5月17日，《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第961～962頁。在大會討論國民黨黨章修改案時，對於“總裁”的產生，曾有建議修改為：本黨以繼承總理領導全體黨員完成國民革命之蔣中正先生為總裁。這樣可以不經選舉，直接就任，但對這樣實在有礙“民主”觀瞻的做法，國民黨內也有人以為不然，郝魯、孫科等都反對修改，唐縱也認為，“經過選舉比在總章規定更為尊榮，歸而寫一報告，建議總裁表示不必修改。”（《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年5月15日，第509頁）蔣介石也不願不經“選舉”而直接就任影響其“形象”，故大會通過的國民黨黨章規定：本黨設總裁，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之，行使第五章所規定總理之職權。（《中國國民黨總章》，1945年5月16日，《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第944頁）

⑧⑧《王子壯日記》，1945年3月28日，第10冊第117頁。

⑧⑨1944年5月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期間，朱家驊、張群、吳鐵城、張治中、白崇禧、熊式輝等，“因不滿於立夫、庸之諸人，相約在全會選舉常委時，不選立夫。”王世傑亦曾面告陳立夫，“此次六全大會之選舉，組織部處長、秘書無一不被選出，或指定為代表；中央宣傳部之秘書、處長無一被選，或被指定之人。予實不勝憤慨。彼云彼亦抱歉！”大會開幕前，陳誠、張治中、白崇禧、朱家驊、王世傑等在吳鐵城宅晤談，“決定聯合對抗陳立夫等所組織之團體，以防陳等壟斷此次六全大會中中央委員之選舉。”（《王世傑日記》，1944年5月24日，1945年4月27日、5月1日，上冊第607、695、697頁）

⑧⑩《王子壯日記》，1945年4月30日，第10冊第164～165頁。

⑧⑪王正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60冊，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567頁。

⑧⑫《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第953頁。

⑧⑬《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60冊，第574～576頁。

⑧⑭《王世傑日記》，1945年5月19日，上冊第701頁。陳布雷和徐永昌投票時都採用了乙案，徑直勾掉20人了事。陳布雷認為，“時間匆促，所勾去之二十人是否適當，已不暇計也”；（《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32年至34年]，1945年5月19日，第774頁）徐永昌認為，“因不識者太多無法選擇，不信任原提名之先後較有意義也。”（《徐永昌日記》，1945年5月19日，第8冊第95頁）唐縱則認為，如此選舉，等於“中委產生全由總裁指定，則黨員意志何在。因此而大失人心，至以為憂！”（《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年5月21日，第512頁）

⑧⑮《徐永昌日記》，1945年5月19日，第8冊第95頁；《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年5月19日，第510～511頁。

⑧⑯《王子壯日記》，1945年5月31日，第10冊第186～189頁。

⑧⑰《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32年至34年），1945年5月19日、20日，第774～775頁。

⑧⑱《陳克文日記》，1945年5月25日，下冊第933頁。

⑧⑲《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年5月23日，第513頁。

⑧⑳《徐永昌日記》，1945年5月21日、24日，第8冊第97、100頁。

⑧㉑王正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61冊，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30～31頁。

⑧㉒《張忠綏致胡適》，1938年8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中冊第673頁。

⑧㉓《陳之邁致胡適》，1938年8月29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673頁。

⑧㉔《沈從文致董作賓》，1944年11月9日，北京：《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3期。還在全國抗戰中期，唐縱已注意到：“中間層以薪水為生活之士大夫階級，因物價之上漲而日見感受生活之痛苦，其思想感情，逐漸左傾，加以我政治之無能，腐化依舊，建樹毫無，此在客觀環境上，均於共黨有利，如再過一年兩年，

縱敵軍不深入夔門，社會亦將有巨大之變動。”（《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0年8月14日，第148頁）

⑩《陶希聖致胡適》，1945年4月30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826頁。

⑪《中央關於目前形勢的分析與任務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432頁。

⑫蔡盛琦、陳世局編輯校訂：《胡宗南先生日記》，1945年3月1日，台北：“國史館”，2015年，上冊第438頁。

⑬《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4年4月28日，第426頁。

⑭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1944年9月28日，台北：“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2015年，第1冊第634～635頁。

⑮《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45年5月16日，第469頁。

⑯《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

1944年9月30日，1945年5月31日、4月3日，第462、514～515、500頁。

⑰《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3年11月13日，第390頁。

⑱《王子壯日記》，1943年11月24日，第8冊第454～455頁。蔣介石對國民黨未來的深重擔憂不能不影響到他的心態。1945年7月國民參政會四屆一次會議在重慶召開，“參政員鄧飛黃告訴人說，此次參政會開幕日，參政員周炳琳代表全體參政員致詞，說話有些很不中聽。例如說現時政治混亂，又說政府應採納反對派的話之類。當時蔣主席在場，頗為動氣，散會後對王世傑等說‘周某的話對我太侮辱了，我要和他決鬥’。後來王世傑勸他不要生氣，這種話在民主政治上算不了什麼。蔣主席不再說什麼，但是預定推周做主席團之一的計劃，卻立時下令改變，改推王雲五做主席團。”（《陳克文日記》，1945年7月11日，下冊第946頁）身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居然說出“決鬥”這樣的話，也可見其當時心態之脆弱。

作者簡介：汪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江蘇南京人，先後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學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歷史學碩士）、復旦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博士）。自1984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工作，先後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民國史研究室主任、副所長，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史，尤其著力於民國政治史研究，在民國北洋政權歷史、抗戰歷史、國共內戰歷史等領域卓有成績。著有《中華民國史》第4、11卷（中華書局2011年），《中國近代通史》第6、10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和與戰的抉擇：戰後國民黨的東北決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影藝的政治：民國電影檢查制度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合著有《世界歷史》第35冊（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著作，並在各權威核心學術期刊發表研究論文百餘篇。現兼任中國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副會長，曾為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挪威卑爾根大學、日本中央大學、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訪問學者。

[責任編輯 劉澤生]